

张群先生话往事

张群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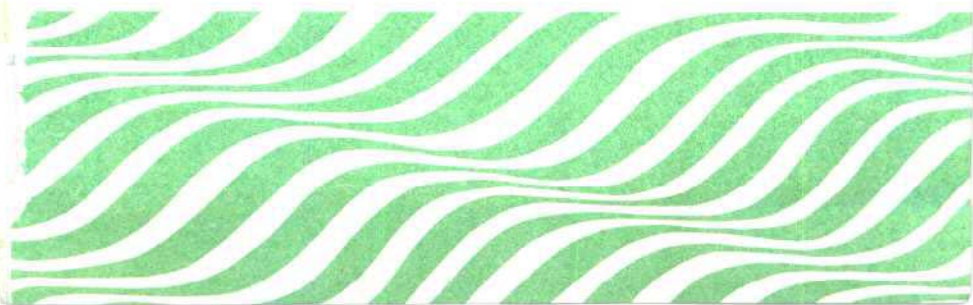
陈香梅笔记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张群先生话往事

张群口述 陈香梅笔记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京)新登字 191 号

书名	张群先生话往事
作者	陈香梅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
印刷	北京新华印刷厂
规格	787×1092毫米32开本 3.5印张 59,600字
版次	1992年10月第1版
印次	1992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2500册
书号	ISBN 7-5057-0306-4/C-14
定价	2.50元

写在前面

张岳军先生今年一百零一岁。这位四川的人瑞，大家都知道他是大名鼎鼎的张群资政。我和他可说是忘年交，蒙他不弃，虽然近年来他体弱多病，但每次我到台北，都要去看望他，和他谈谈。最近一次是今年的十月中旬。

我约好了早上十时去他士林的私寓看他，他在那房子里已住了二十多年，他的夫人马育英女士也是在那儿过世的。他们初到台北时住在城里，房子较小，但常常高朋满座，因为岳公夫妇人缘好，又好客，大家都欣喜和他们做朋友。张夫人是一位非常虔诚的基督徒，而且是心口如一，乐善好施的人，没有半点贵夫人的习气，这在官场中是难能可贵的。

张夫人去世后，张老先生真是失去了相敬如宾的老伴。还好张家的子女和儿媳都甚有孝道，对于老人可说甚尽职责，尤其是张继正夫妇，和老人同住，奉侍起居，这在今时世风日下的境况中，更不多见。

岳公生于1889年（即清光绪十五年），他的出生地是中国的四川省华阳县。他出生时正是日本不断压迫清朝政府，订立了若干屈辱的条约。当然中国人对于日本的仇恨日渐加深，但更痛恨清朝政府之无能。就在那个时候，日本派兵入侵朝鲜，在进据朝鲜之后还乘机横渡鸭绿江，

进入东北境内，又自旅顺渡海，进军山东，接着又挥军南下，占领澎湖群岛，进逼台湾。无能的清政府只好派李鸿章赴日议和，等于求和，这就是有名的辱国的马关条约。马关条约的重要条款是：（一）承认朝鲜为自主国。（二）割辽东半岛及台湾、澎湖与日本（后因俄、法、德三国为了自身的利益出面反对割让辽东半岛，由中国出款三千万两黄金赎回）。（三）赔款二万万两。（四）开长沙、重庆、苏州、杭州等处为通商口岸。这些丧权辱国的条款都因清政府之无能和日本对中国的野心所致，后来日本人还在马关行刺李鸿章，真可以说是残酷绝顶，苛刻之极。

1900年，中国又发生了义和团之变，义和团徒众进入北京，侵袭外国使馆，清政府无法制止，于是英、俄、法、德、美、日、意、奥等八国乃采取联合行动，进兵中国，这就是有名的“八国联军”之役，日本更借此逞凶，两个月的战争，败者当然是中国，最后又由清廷订了所谓“辛丑条约”，向各国赔款共四万万五千万两，而日本共得三千四百七十九万余两，占全部赔款率百分之七点七三。这之后不久，1904年日俄战争，而其战场却在中国的领土，而且是为争夺中国领土而战，结果俄国又把在中国领土上所得权益转让给日本，最重要之一点是辽阳、长春、哈尔滨、满洲里等都开埠通商，准许外国人居住，开伐鸭绿江森林，而东北的中东铁路全由日本经营。

岳军先生就是在这种充满耻辱的环境中长大的。那时孙中山先生已于各地倡导国民革命运动，激起了无数

青年救国的意愿。而生长在四川省的张群也决定投笔从戎，入了保定军校。后来于1907年冬又被录取送往日本留学，到了东京进入振武学校。这所振武学校是日本政府专为中国留日军事学生而设立的陆军预备学校。三年毕业后被分发到新泻高田第十三团野炮第十九联队见习。当年蒋介石也在此与张群相识，并且同地见习。建立了他们两人七十年的交谊。

我常问岳公他对日本既有如此仇视心理，为何却要去日本留学？他告诉我，原因甚多，第一，中国青年人都公认清政府无能，若要对付日本，首先要了解日本，而且当年日本正厉行明治维新政策，清朝维新行不通，日本却成功，定有其因素，他很想去了解、充实自己，谋求协助国家富强的知识。第二，是要取求新的军事学识，以便回国参加实际救国行动。第三，孙中山先生已在日本创立了同盟会，招收同志，蒋介石和张群都同时在日本加入了同盟会。

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发生，张群回国参加了陈英士在上海发动的革命战争。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为了平息南北的争议，让总统位于袁世凯，不料袁氏竟欲称帝，于是孙先生只好又发动讨袁，史称“二次革命”，不幸事败，张氏夫妇第二度逃亡日本，1916年袁世凯病亡，革命党在广州成立护法政府，推孙先生为大元帅。张氏和蒋介石被委任为元帅府参军。这是张氏前半生与蒋氏的结合，其后在对日抗战前数度与日本军政人员办交涉，对日本

人认识最清楚，对中国军阀认识也最清楚。

1935年张氏出任外交部长，与日本人忍耐地谈判，直到1937年3月离职。他曾多次对我谈到他那时工作的艰巨，直所谓弱国无外交。在这期间还有“西安事变”的发生，年轻的东北少帅张学良在蒋介石访问西安时，与杨虎城发动兵变，扣押蒋介石，要蒋氏马上宣布全国抗日。

我多年来劝岳公写自传，他不肯。他说他不方便写。这一点我极不同意。十年前他总算出版了一本《我与日本七十年》的书，这儿所写的有不少是他亲口对我详述的史事，也有一些是引自他的那本著作。前几年他身体还不太坏的时候，我替他写了一本《与张岳军谈往事》，是抛砖引玉，把他那本《我与日本七十年》的书引出来了，张氏的日记手册不少，据他说全部交给了中国国史馆。我每次劝他多写点近代史，对后人有个交代，他总说：“你写嘛，你来写我就放心。”可惜我二十多年来还有许多事疲于奔命，无法替他服务。

现在我想谈谈这位极有风趣的老人，他对人生有一套胜于常人的哲学。比方说他心胸宽阔，为此追随了蒋介石七十年，在复杂的环境中是个不倒翁，在蒋氏天下又得应付孔宋那些权贵，又得为蒋氏做和事老，七十年寒暑如一日，不是普通人可以做到。他的特点是不为自己私利而争，凡事看得广、远、阔。所以他说：“一笑一少，一怒一老。”又说人生七十方开始，多么豪人豪语！

他也会喝酒，而且有一番哲理。他说：“喝酒有些条

件，第一主人要好、第二客人要好、第三酒要好、第四酒品要好、第五下酒菜要好、第六谈话要好、第七光线要好、第八环境要好、第九太太要好，即使喝醉了，回家也不挨骂。”我常拿他这些条件向友人介绍，大家都非常佩服。

张氏早年对于中国艺术古玩多所收藏，尤其是书画。他和名画家溥心畲、张大千、蓝荫鼎都是好友。于今只剩下一位黄君璧，而黄君璧身体甚差，两人无法再往来。

使我感动的两件近事，一是岳公为张少帅和赵四小姐做证婚人。一是参加了张学良将军的九十大寿。还有他把自己珍贵的收藏全部送给了台湾的故宫博物馆，不自珍爱而让大家分享他的稀有珍宝。

陈香梅

目 录

写在前面	1
谈谈我的早年	1
谈谈我的婚姻	6
谈喝酒	12
与日本结下了不解之缘	14
任外交部长的回忆	29
访日归后述感	65
对日往事	71
论“敌友之辨”	83
张群著《谈修养》	94
张群简历	102

谈谈我的早年

我是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即民国纪元前二十三年,出生在四川与云南交界的一个小县份。那时父亲在该地做官。我共有兄弟三人,姊妹两人。八十年前,滇川边界可以说是一个文化落后的不毛之地,我小时的教育都是由父亲延师到家授馆,我也参加过清朝的会考,不过后来因为保定陆军速成学校在川招考学生,我在成都参加了考试,而且被录取了。这一件事可以说是决定了我一生的大计,因此与蒋先生相识,同学共事,共同参加革命,这是后话,暂且不提。再说童年的事,也可借此了解当时我家乡的生活环境,以及医药的缺乏情形。

我十岁那年,我的祖父去世了。当时家里请了和尚来念经。那时是冬天,农村里用的是泥做的火炉,泥炉中有一个洞,生火的人用一铁管在洞中上上下下地转动,借此控制炉火的大小。我当时童年无知,又好奇心重,看见大人生火,觉得非常有趣,于是趁着大家离开灵堂休息的时候,偷偷地拿起了铁管,拼命地往火孔中推转,哪里晓得炉火已经很旺,再加上我不停地煽动,泥炉忽然爆裂,一块红热的火块竟跌落在我的脚背上。当时我穿的是缚带

的帆布鞋，火块粘在脚背上，又痛又急，于是大声呼救，等到大人来把鞋子袜子脱去时，鞋袜固然差不多已成灰烬，我的一只脚也几乎见骨不见肉，一直痛到心坎里。这件事，如果在医学昌明的今日，早已被救护车送到医院去诊治，但七八十年前的农村，不但没有医生，也没有现成的药品，这时只有听候家人的安排，把一只脚泡在酸水里，这更增加痛楚，不过据说可以消毒，防止溃烂。这一场灾祸害得我很惨，一连三个多月不能行动，结果总算无医自愈了。

后来家父宦移成都，我们算是迁居到大都市。在那时，大家已渐渐感到清廷的腐败，我是十来岁的男孩，在成都也有机会读到一些革命性的读物，心中的革命意识也在此时渐渐生根。我就这个时候考取保定陆军学校，决定投笔从戎。家父给我六十银元，作为旅费，赴京参加会试。当时同行的有另一位青年朋友王君，我们两个性情相投，志同道合。会试时，由段祺瑞亲自召见，监考官就是他的部属，他叮嘱我们在拜见段祺瑞时，一定要行请安礼（即北方旗人的屈膝半跪式见面礼），我认为这有失我的尊严，于是我对监考官说，假如要行这种旗人请安礼，那我就宁愿弃考回乡。我的监护人，也就是我的保证人急得要死说：“这怎么可以呢？而且你若弃考，那么连回家的盘费都没有着落，你还是将就一点吧。”我和同学王君商量，两人决定来个金蝉脱壳之计，那就是去就考而不做答题，来个交白卷，看他们如何发落。两人商量妥当后就假

装同意去应试，同来的监护人也就高兴万分。那次考试的课目共分三科，即国文科、数学科和理化科。数学和理化我为了表示抗议根本一题没有作答，但国文题目却引起了我的兴趣，于是大做文章，自己也认为非常满意。本来我想既然我交了两科白卷，一定不会被录取，结果出乎意料之外，我竟金榜有名，而且与其他被录取的青年，一同得到段祺瑞的召见。这时我又对监护人提出抗议——我拒绝请安。这可难为了监护人，他们一半劝说，一半威迫我就范，我想当时大家一定认我是一个大逆不道的叛徒。段大爷驾到后，我们被个别点名去见段氏。轮到我时，我只向前走了几步，点点头，左右的人高声喊“请安，请安！”我当时年轻气盛，马上回答说：“我从来没有请过安，不知道怎样做。”他们见我如此，竟也不再勉强。我想其时当政的旗人已非常担心汉人的反叛，遇到我这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与其把我除名，倒不如把我收到军校训练一番为上，这也许是欲擒故纵之计。

我本来为了反抗代表专制的请安以及与请安相同的各种规定而不愿进军校，想不到人算不如天算，竟顺利过了关。我也只好暂时听候安排，准备到了学校再作道理。到校之后我当然不像其他的旗人学生那么百般服从，记得有一次上课，老师出了一个国文题目，我认为可以借题发泄我心中不平之气，于是又大发牢骚，发挥我的反专制言论。学校的校监对我真是无可奈何。总想找一个机会，把我放逐到什么地方去，以免在学校生事，而减轻他的责

任。

时值清廷正计划保送一批青年赴日留学。一天晚上，我已在宿舍就寝，忽然校监来到宿舍把我从睡梦中推醒，他说：“你已考取了留日考试，马上就要你去日本。”我一时大喜过望，人也醒了，这是光绪三十四年的事。

到日本留学是我生命史中值得纪念的一章。因为我不但在那儿认识了蒋先生，而且遇见了许多后来共倡革命的同志。我本来准备学步兵的，可是与蒋先生一见如故，于是不学步兵而学炮兵，以期与蒋先生朝夕相处，共同切磨。我们当年都是留发（带辫子）出国的。到了日本就把辫子剪掉，这也是从事革命的第一个表示。当年一同在日本留学的，现在已多数不在世了。硕果仅存的人，也都垂垂老矣。

武昌起义，我和蒋先生乃从日本偷渡回上海。我还记得当时蒋先生穿着的是和服，我穿的是民装。我们的名字已在清廷的黑名单之中，通缉令发表时，日本人到处抓人，可是我和蒋先生已在东京回上海的轮船中。到达上海时，我口袋内仅剩下一块银元。

回国后不久，就参加陈其美（英士）先生领导的上海革命战役。上海光复后，沪军都督府成立，陈先生任都督，黄膺白（鄂）先生任参谋长，我任军务处军械科长。

蒋先生回杭州参加革命，浙江光复后，组成新军一团，开至上海，称沪军第五团，蒋先生自任团长。后来扩编为二十三师，黄先生任师长，蒋先生仍任团长，我任参谋。

革命虽然成功了，但那只是昙花一现。二次革命失败后我又亡命日本。

这时我已在上海结了婚，我的内人马育英也是革命同志，与我同岁，是江苏昆山人。

我第一次去日本，进的是振武学校，三年毕业。毕业后以士官候补生资格，分发到新泻高田第十三师团第十九联队实习，与蒋先生同队。

第二次去日本，是在民国二年（1913年）讨袁失败之后，上海袁氏爪牙大捕国民党人，我与内人及许多同志一同亡命东渡。这时日本政府恰巧宣布辛亥年在联队之士官候补生，可以正式入陆军士官学校，我乃又入士官继续学业。内人马育英则入长崎活水女子学校深造。

我在士官学校毕业后，时在民国四年（1915年），国内政治环境愈劣，袁世凯正阴谋恢复帝制活动，不容许我们回国，日本又提出对华二十一条的无理要求，迫袁氏接受。在日本我们也无法找到适当的工作，我只好应友人之邀，到荷属印尼爪哇的中华学校去教书，到民国五年（1916年）才自南洋返国。

谈谈我的婚姻

内人马育英女士在世时，许多朋友都羡慕我们的美满姻缘。自 1912 年结婚起，迄 1974 年内人逝世止，我们共同生活了六十三年岁月，而且互爱互敬，这在世界上确是罕有的事。

谈到我们的婚姻，就要回溯到民国以前我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当时我有一位同学王柏龄，是扬州人。有一年暑假，他要回扬州老家，顺便约我到扬州去玩。那时，上海、苏州、杭州、扬州这些有名的名胜地方我都还没有去过。但是，扬州的湖光山色我是向往已久的。扬州有个瘦西湖与二十四桥，古人诗中有云：“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烟花三月下扬州”，“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这些诗句，我早都读过。所以一提到扬州，就引起了我的兴致。决定和王君同路经上海，前往扬州一游。

在经过上海时，我顺路去拜访一位姓张的本家，他从前在四川中学里教过英文，是我的老师。我知道他在上海，顺便去拜谒他。当时他给我介绍了好些他的亲友，并且约我和他们一同去教堂做礼拜。在这段时间里，我结识

了一位在教堂任职的朋友丁文骏。

民国元年(1912年)我再去上海时,又会见了丁先生。他古道热肠,自动地要替我做媒。因为丁先生在礼拜堂任职,所以时常约我同去做礼拜。我们做礼拜的教堂叫怀恩堂,位于上海北四川路。他给我做媒的对方就是怀恩堂中弹钢琴的小姐。

那位弹琴的小姐就是我以后的太太马育英女士,她是江苏昆山县人,生于民国前二十三年正月十一日。他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她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岳父讳霞城,我的岳母是他同邑的彭金凤女士。马家家境原本小康,不幸,育英七岁那年,霞城公弃世,接着他的两弟一妹也先后夭折,遗下育英母女二人,相依为命。后来,岳母去上海,入圣经学校,毕业后任传教工作,往来于上海昆山间。育英以受母教为多,十一岁时,因得浸信会吉慧丽、柏乐提两教士之助,得入上海浸信会主办之晏摩氏女子中学就读,十三岁受洗归主,十九岁毕业后,就应扬州慕究理女子中学之聘去教书。三年后返沪,再回母校晏摩氏女校任教。千里姻缘一线牵,我因丁先生介绍,得识育英。

经丁先生介绍后,我们时常见面,但都是有往无来。因为当时晏摩氏女中校规极严,她不能出来,只能由我去看她,所以我们的来往是往而不来的。她的老师是外国人,相当守旧。每当我去看她时,那位外国老师就拿一本书坐在我俩的旁边,等于是监视我们。我们也曾曾在媒人丁先生家同席吃过几次饭,时间都是礼拜天。双方表面虽

很矜持，但彼此却是心心相印的。那时青年男女要看一场电影、吃吃馆子是绝不可能的事。那位善意监视我们的外国老师，一直等到我们结婚的前一天，才离开我们，允许我们自由。

民国元年(1912年)四月我与育英订婚。原拟于六月间结婚，但不幸我突患了伤寒，病得很重。当时我任军职，身体原来很好，不料有一次骑马遇雨，受了凉，就染上伤寒。我与育英虽然已经订过婚，但是恪于教会学校规定，当我住院时，育英仍旧不能前来医院探视。为了这场病，婚期不得不延搁下来。

我们的婚礼迟至民国元年(1912年)十月五日才举行。我与育英虽然都是基督徒，但所属的教会不同。我是圣公会，她是浸信会。最后，我们决定在她的怀恩堂去举行婚礼。婚礼完全是宗教仪式，一切都由外国牧师安排。那天结婚的礼堂完全用青色的竹子来装饰，与众不同，也别具情调。六十几年前用青色来装饰结婚礼堂，恐怕也是创举。因为有这段值得纪念的往事，所以三年前当育英去世时，在追思礼拜中，我也用青色的竹子来布置灵堂。

婚礼举行前，我正代理团长。当时的团长是蒋先生，他因公出差，由我代理。刚好团部有一辆双马驾驶的马车，可以借用当作结婚的礼车。马车在当时算得上最新式的代步工具，车身很漂亮，顶篷可以撑起来。这辆摩登的马车便代替了花轿。我当时的住处是在弄堂底，车伕认为双马车进不去，我认为可以实地研究勘察一下。因为我本